学术专论

19 世纪 80 年代文字改良舆论下明治政府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

曹　雯

［摘要］19 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西学、汉学之争仍是焦点。当时有些人以为，欲兴近代教育，当废弃汉字；若废弃汉字，日本恐将与自己通过汉学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发生割裂。而在民间舆论未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之前，于文字文体改良，日本政府虽做了些许尝试，但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并未做出改变。反映在小学教科书的编纂上就是，虽然在小学低年级阶段，尽量不用汉字，代之以假名，但就小学阶段所应掌握的汉字数量而言，并未减少，只不过汉字学习被集中到了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一现象印证了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汉字汉文何去何从，仍保持着谨慎态度。

［关键词］日本明治　汉字汉文　西学　汉学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1－0124－09

前言

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开展，日本的文字改良走上日程。其表现为，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一个文字改良舆论造势的时代。即在渡过初期的文字改良启蒙期后，不同的改良主张纷涌而出，接受社会民众的洗礼，而最后的胜出者则有望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其中，假名文字论、罗马字论、精简汉字论是社会力量鼓动文字改良的三个主要方向。不过，无论是假名文字论，还是罗马字论，都因其改良主张过于偏激而导致一般社会舆论对这两种言论保持着警惕态度，而精简汉字论则因其温和且符合实际，赢得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①需要强调的是，在获得上述认知后，尚须追问：对于这一民间舆论，明治政府有无做出回应？如有回应，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毕竟，舆论只是民间倡议，而若将民间倡议化为现实只能依赖政府。因此，笔者欲借助本文继续探讨面对那些轰轰烈烈的社会舆论，明治政府做出了何种回应。笔者相信，只有透过上述方式的观察，才能窥破汉字汉文在明治时期日本的真实处境，以阻止将任何一种民间舆论（比如全盘西化者的言论）直视为当时社会状态这一思考模式对于今天知识者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与现有相关研究极为不同之处。单线条式的研究导致研究者们或把日本语言的改良放入一个现代语词独

［收稿日期］2015－11－10
［作者简介］曹雯（196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北京 100872；caowen330@ sina. com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清代中西、中日文化关系史研究：以语言的交流互动为中心”（项目号：08JJD770090）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考拙文《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民间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江海学刊》2015 年第 3 期。

立发展的历程中去观察，或将其纳入思想史的范畴，以观察其在思想领域里所造成的影响，或将其直接划入日本政府的改革进程中，仅略述其改良的大致过程，而这样或分别独立或局部放大的观察方式都是本文所要极力避免的。在近代，民间舆论固然对某种新事物的肇端乃至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但付诸实施的毫无疑问是政府，只有将两者对于该新事物的态度以及行动结合起来考证，才能在浩浩历史长河中准确抓住其发展脉络。

一、由小学读本看明治政府的文字文体改良态度

19 世纪 80 年代，面对铺天盖地的改良舆论，日本政府的反应虽可称之为谨言慎行，但文字文体的变化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发生。明治 22 年（1889）4 月，官报局制定送假名法，以官报号外出版发行，而后凡官报中之送假名均依据该法书写。6 月 8 日，上田万年在大日本教育会上，发表题为《论语言的变化与国语传授之事》的讲演。10 月，在大日本教育会总集会的讨论会上，小学课程中应设置国语科目的议案被提出。是年，久米干文、上田万年、三上参次等将相关教师以及干事召集到皇典讲究所商讨确立国文学教授法以及振兴国文学的计划。明治 23 年 5 月 1 日，言语调查所所刊《言语》第 1 号发行。明治 24 年 4 月，佐藤宽在皇典讲究所讲演志上发表题为《日本语学扩张的方案》的文章。6 月 25 日，佐藤宽在其题为《国语会话的必要》的文章中指出，为扑灭全国方言，应在小学校课程中设置国语会话科目，只有如此，才能使俗语逐渐向雅言靠近①。

在上述文章的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国语”一词频繁出现。“国语”一词的运用虽不启自这个时期，但“国语”作为一个固定概念使用却确实造端于这个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并没有将新出现的文字书写方式定义为“国语”。对于这种新的书写方式，人们用不同的词汇，例如“邦语”、“日本语”、“国言葉”等给予称呼。而所谓“国语”一定与日本近代国家的诞生不可分割。在经历了 20 余年的维新后，“国语”一词尘埃落定，成为对“汉式和文”进行改造后的书写方式的正式称呼。“国语”这个词汇是日本人利用汉字创造出的新汉语，它不同于我们中国古籍里出现的“国语”所隐含的意味，它是日本新的书写方式的代名词。后来，这个词汇被引入中国，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用课本上所用的“国语”两字，其含义是与日本语相通的，完全偏离了“春秋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这一本义。

然而，若要考察、理清整个 19 世纪 80 年代日本官方对于文字文体改良的态度，还是得从对教科书抑或政府文书的研读等方面着手。鉴于文字改良的初衷是为了加快国民教育的实施进程，故考察日本国民教育的实施状况或能一窥日本政府对于现行文字文体的态度。

明治 8 年 1 月，日本政府颁布教育令，规定小学生的学龄应为 6 岁至 14 岁。随着地方经济差异造成的教育问题日趋严重，整改教育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遂有第 1 次、第 2 次、第 3 次教育令的相继发布。第 1 次教育令发布于明治 12 年 9 月 29 日。由于学制在设计当初没有考虑到日本与欧美国间在国力、民情、文化上的差异，以致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调整、制定出符合日本国情的教育体制成为教育实施机构的迫切需求。在新制定的体制内，中央政府不再要求各地按照统一规定实施教育计划，而是把教育规划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各自因地制宜，制定出符合当地实情的教育计划。按照新体制，学校分为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师范学校、专门学校以及其他专业学校等。为完善初等教育环境，针对小学校，特别做出许多规定。比如，废除学区制，以街道、村落为单位，根据具体需求，相应设立小学校；其校务管理人员不再由官府任命，而是通过街道居民、村民的选举产生；义务教育时间不少于 16 个月即可；公立小

① 上田万年、佐藤宽、文米干文、三上参次等均为当时日本著名的推动文字文体改良的学者。皇典讲习所，成立于 1882 年，日本国学院大学的前身。

学校的学习实践由原来8年缩短至4年，每年授课时间不少于4个月即可；同一社区，如果有私立小学校存在，可毋庸再设立公立小学校；贫困地区，可派遣教员实施巡回式教育。①

第2次教育令颁布于一年后的明治13年（1880）12月28日，对第1次教育令中不合时宜的部分进行了调整。最大的问题是，第1次教育令中所体现出的宽松精神，导致就学率急速下降。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为节省经费，地方政府停止校舍建设，甚至废弃小学校的现象时有发生。上述现象遂招来有识之士的批判，要求改正的呼声一时高涨。第2次教育令的核心精神依然是由国家即中央政府来统筹构建教育计划。凡教育行政上的重要事项均需经过文部大臣的认可，然后由各府、县知事督办；公立学校、幼稚园、图书馆等设施的废弃必须获得当地府、县知事的认可；各街道、村落必须设置足够数量的小学校以满足学龄期儿童的就学需要；私立小学校取代公立小学校以及采取巡回授课方式的申请均需获得当地府、县知事的认可；明确义务教育年限为3年，每年授课时间应在32周以上（8个月左右），3年期满后，如无正当理由当继续升学；小学校必须设置“修身”课程；明确各府、县必须兴办师范学校等②。

第3次教育令颁布于明治18年8月12日，是对第2次教育令的补充。第2次教育令颁布后，日本教育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小学校、师范学校、中学校的兴办数量稳步提高。小学校的学年划分趋于稳定，教科书的编纂以及使用走上正轨。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地方停拨教育补助金，造成地方苦于筹措教育经费，要求改正的呼声遂又浮上尘嚣。在颁发的第3次教育令中增加了以下几项内容：认可经济不富裕地区可相应减少教育经费支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认可等同于小学校的“小学教场”实施普通教育；不再限制小学校以及“小学教场”建立学科制度，可实施适合于儿童状况的普通教育；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教育时间可设置成半天（上午或下午）加晚上2小时；废除学务委员，由街道、村落的户长来担当。这次的规范程度介于第1次与第2次之间，其意旨是既要不过多加重地方政府的经济负担，又要保证学龄期儿童能接受到初等教育——小学3年义务教育③。

由此可见，日本在创建国民基础教育体系过程中迂回曲折，进二步退一步，以适应日本社会的发展现状。到明治20年左右，即在学制颁布15年后，日本已经初步拥有一定规模的小学校、师范学校和中学校，而且将国民义务教育年限定为3年。也就是说，自明治20年起，日本进入学龄阶段以后的国民均应接受过3年或3年以上的教育。

笔者列举一本出版于明治19年（1886）的小学读本以考察小学教科书的文字文体实际改良状况。这是一本用于一年级“读方科（阅读方法课）”的课本。其序言详细列举了该科目的教学方针以及达成目标。其一，读方科的教授可通过开发法和注入法进行，利用开发法，令学生领悟事物之状态；利用注入法，令学生掌握文字以及章句等。其二，读方科的教授，第一在于领悟事物，第二在于文字记忆，第三在于掌握章句之变化。其三，该科教授过程中应注意如下事项：1. 阅读方法上有音训之差异；2. 书写方面有楷、行、草之别；3. 日用文书中的普通文章间存在差异；4. 文字有上下结构以及左右偏旁之差异；5. 文句中存在名词、动词、助词等。其四，读方科教授中应注意纠正学生之文字发音以及培养正确的诵读方式。其五，读方科教授过程中，应注意纠正学生的体态以及课本的拿法④。

翻阅这本小学初级读本，笔者发现其与学制颁布时期发行的读本有了明显差异。其一，该读本中所出现的假名均是平假名。其二，与之前读本里汉字、假名所占比例大致各半的情况相较，

---

① 《太政类典》，第3编，第55卷，《学制·教员制置及属员》，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09－00·太00660100。

② 《太政类典》，第4编，第37卷，《学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09－00·太00742100。

③ 《公文录》，第89卷，《文部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10－00·公03984100。

④ 日下部三之介：《小学读本 卷一》，金港堂，1886年，序言。

该读本所利用的假名文字数量远远超过了汉字。尤其在开端部分，一篇课文仅出现二、三个汉字，虽然随着课程程度的加深，汉字量开始有所上升，但也仅限于名词部分，动词以及接续词仍大量利用假名。其三，课文内容较之前变得更加浅显易懂，均是发生在孩子身边的事，比如用简单的假名描述狗、猫等小动物；叙说男孩、女孩间的差异；简单介绍一下书是用来干什么的以及学校是做什么的；灌输一些自然界的小常识；帮助学童理解人类生存的方式等等。通过这些简短易懂的小文章，学童可以掌握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基本名词、动词以及接续词。① 我们可以看到，这本小学读本是贯彻第 3 次教育令教育精神的产物，即鉴于学童间的差异，初学阶段所设置的授课内容应当简单易行，以保证就学率的提升。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初学阶段的汉字使用量在大幅降低，但整个小学阶段到底需要学生掌握多少汉字呢？笔者列举一本发行于明治 20 年的普通读本“字引”（即字典）来试图回答以上问题。这部“字引”显然是为精读读本而编纂的，其所载字、词基本来自读本。据笔者统计，该部“字引”共收纳单个汉字即单字词 847 个，双字或双字以上汉字词 1509 个，若按照双字词计算，汉字在 3000 个左右，两项相加，并清理重复汉字，该部“字引”收纳汉字当在 3000 以上②。若此，这一标准与明治初期发行的普通读本“字引”所收纳的汉字数量差距并不大。也就是说，尽管社会上要求精简汉字的呼声不断，但在实际的基础教育阶段，汉字基础掌握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不过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却值得注意。比如，与明治初期版字引以收纳单字词为主的特征相较，这部“字引”所收纳的双字或双字以上汉字词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单字词，这说明日本政府开始加快对汉文的改造，以适应日本文字文体的发展需求。不过，将汉文中出现的搭配式双字词抽出并作为固定词语使用的方式，一举打破了中国文章以单字词叙事的行文规矩，这不仅规划出了日语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后来中国语的近代化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人家、危难、重荷、劳苦、羸弱、甘美、证据、交通、强韧、珍奇、猛恶、炊烟、果断、情愿、艰难、商旅、素颜、忍耐、独吟、安堵、起伏、感戴、形势、毕竟、兴废、治乱、本分、多难、辛苦、运搬、转机、稽古、轻视等等词语均被作为固定词语给予使用。另外，假名词语的出现也是该部“字引”尤为引人注目之处。比如，由于假名文字在文章中所占比率的增大，假名词语的固定化以及常用化成为一种趋势，“字引”中对一些固定使用的假名词语加以注释即是明证。

从“字引”中出现的一些词语可以判定，这时期的读本内容较前有所发展。比如西洋、洋服、发明、通行、职业、休假、自由、铁道、建筑、瓦斯、石炭、循环、安全、国家、欧洲、政务、寒暖计、玻璃管、为替、银行、株券、请负、经济、约束、产业、实验、剩余、夏至线、热带、寒带、冬至线、空气、卫星、机关车、氢气球、圈线、斜射、太空、制炼、电信线、时针、分针、列车、铁轨、精神等等代表新知识、新思想的词语或被造出，或被赋予新含义后进行使用③。这表明对于实学即西学的关注乃至吸收程度继续在提高。

那个时期，教科书的编纂并没有受到严格规范。比如，假名应该是以片假名抑或平假名出现？在笔者查阅的教科书中，上列小学初级读本虽然使用的是平假名，但在另一些教科书内，其所使用的假名却又是片假名，这表明参与当时设计构建国民教育的当事者，其自身之间的意见并不统一，有大力推广平假名者，亦有倾向保留片假名在文章中之地位者（按：在文字改良前，官文书内所用假名基本为片假名），而负责审查教科书的文部省也没有就此形成一个明确的规章。除假名使用问题外，就教科书内容难简程度，在政府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从笔者下列教科书内容即可观察到，其文章的复杂程度超过此前所列举的教科书。比如有文如下：

---

① 日下部三之介：《小学读本 卷一》，金港堂，1886 年。

② 青木港三郎编纂：《普通读本字引》，集英堂，1887 年。

③ 上列词语均摘自青木港三郎编纂：《普通读本字引》，集英堂，1887 年。

前橋ハ高崎ノ近傍ニアル。市街ニシテ。亦繁昌ノ地ナリ。此地方ニテハ。多ク蠶ヲ養ヒテ。絲ヲ製ス①。

这段文字依然保留了明治初期的行文风格，使用片假名，并且无论名词、动词等均使用汉字、汉语词，而此前所列举的日下部三之介著《小学读本》，一段话仅出现一到二个汉字、汉语词，且仅限于名词的场合。不过，该本教科书所展示出的新气象值得关注，就是开始加注断句符号“。”，这也是语言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文字改良趋“国语”化的发展态势

这个时期，虽然我们尚未看到日本“国语”最后被定型成何种状态，但朝着“国语”方向发展的趋势很清晰地显现：随着日本国民国家雏形的建立，日本文字文章改良的最后产物——“国语”必将以某种形式确立下来。比如，从欧洲留学归国的上田万年于明治 27 年，在其名为《国语与国家》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国语”，并将“国家”以及“国体”这样的近代概念与“国语”联系起来，直接道明了“国语”所包含的西方近代文明性。而在这“国语”一观念破土而出的萌发时期里，佐藤宽的研究不得不给予关注。

佐藤宽于明治 24 年，在皇典所发表有关“国语”演讲之际，他的专著《日本语学新论》也在当年出版。这是继主张汉字精简论的矢野文雄之后，关于文字文体改良的又一部力作，也可以看做是矢野文雄温和改良主张的延伸发展产物。

针对罗马字论，他如此反驳道：现在的书写因夹杂着汉字和日语而显得极为不便，无论是“かなのくわい”（“假名的会”）还是“罗马字会”其宗旨均为欲消除因使用汉字所带来的不便以及使得文章更加简明易懂，并最终达到言文一致的目的。而其实全盘利用假名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日本文字没有罗马字化的必要。与罗马字会的提倡者不同，他认为假名书写速度要比罗马字快，比如“道理”一词，用假名是“ことわり”四字，而用罗马字则是“kotowari”八字，比假名多出四字。至于日本文辞不规则、不确定的问题，可以让不规则的部分规则起来，不确定的部分确定起来，若此，经过改正的假名一定比罗马字好用。②

但佐藤宽笔锋一转道：既然假名这么便捷易用，为什日本人还是不能丢弃汉字呢？原因在于，若全用假名，一则文章将过于冗长，一则会出现歧义，而夹杂汉字使用，则可避免出现上述现象。当时，日本语尚未确定缀字法，若缀字法确立，可减少汉字的使用。再者，日本人已经惯用汉字，不仅使用汉文直译体的人在使用汉字，即便使用雅俗混淆体（矢野文雄所谓的杂文体）的人，甚至如蒙童、妇女亦在使用汉字。结果，为了让蒙童、妇女尽快理解汉字，一些针对此类人群的读物都会在汉字旁加注训义。③ 这就是矢野文雄所谓的两文体了。

比矢野文雄较前发展一步的是佐藤宽开始明确提出“语学”观念，即对语言应进行有步骤的研究。他指出在做语学研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首要制止目前语言文章的混乱现象。二，能够阅读古典书籍，并能解读其大意，同时要了解发音之正误以及该语词之渊源。三，在了解发音之正误以及该语词之渊源时，因解明出自何种方言俚语。四，抛弃不正之语词，使用原本正确的语词。五，在平常的谈话中，注意正确使用语词的过去、现在、未来时态。六，文章是用语言写成的，如果语言用错了，文章的表述就会随之发生问题，所以写文章要用心去写。如今，日本语言文章混乱运用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外国的不正音以及不正确语词仍源源不断流入日本，如果再不及时加以制止和纠正，日本将无法确立自己的国语。七，要能辨别语词正确与否。

---

① 井田秀生：《国民课本 卷四》，长岛为一郎出版发行，1887 年，第 2 页。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东京文明馆藏版，东京堂出版，1901 年，第 70—73 页。

③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87—88 页。

八，确立日本语语法（文辞）的规则。九，现今处于彼我杂居、知识交换的时期，文章基于语言而书，于此，语学之研究尤为重要。十，彼方欲知我方事情，我方又要阅读古典书籍，如何建立一标准以满足上述两要求是目前语学研究之重点。就如何制止目前语言文章的混乱现象，他提出了解决方案：写字一定要以“汉语”为标准；训读（解义）一定要以“国语”为标准，然后寻找一种既简洁又不失平民化的文体。① 佐藤宽所讲的这种文体，关键在于保留多少程度的汉字。当时，在汉字精简方面，各方有大量议论以及自我的实践活动。可以说，这时期的日本语学研究一直跟随着文字文章的改良，即为文字文章的改良提供意见抑或依据。而佐藤宽的上述十点意见即提出了自己所期待的文字文体改良方向。

佐藤宽强调，若不实施正音、语言纠错之措施，整顿文字乃至文章则属奢谈。因此，撰写语学书，制定语格（语词本身变化的标准）和文法（章句变化的标准）之准绳乃当务之急。在制定语格标准时，应折中采用古今雅俗音训之语词；在制定文法标准时，自章句组织、形容词、副词之位置，至反语、省略语、助词等，既不拘泥于古风，也不完全附会于西洋文字文法，应确定出具有日本现今国体特色的文法。语格书又可称为语典书，而文法书则可称为文典书。同时，他建议缀字书亦应被编纂，即首揭五十音图以及清浊拗音之结构，次列体言、用言、单语、连语等，再适时插入简易文章以为运用，而此类书籍当为初学之蒙童所常备。②

就如何开展语学研究，佐藤宽给出具体方案：首先于公、私立诸学校内设置国语科。这是因为德育的基础应建立在国语之上。读书，基于此而著文，基于此而表达思想，基于此而交换知识，基于此而畅游于品尝谈话以及交际中。德育之基础在于以国语知国体之尊严，比如英语之变迁，中国语之变革，虽有外来语侵入，但其本土语并未消亡，而只有保留自己本土之语音以及语词，才能保全本国之体面抑或尊严。他遗憾地说，有着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日本却大部遗失了自己本土的语音以及语词，若要重获国体尊严，寻回本土之原音以及原语实乃养成日本大和魂之首要条件，亦为语学研究之当务之急。只有养成日本大和魂，于输入洋学时方不至为其所同化。明治22 年以来，帝国文科大学改和文学科为国文学科。随之，高等中学亦效仿之。于此，他期盼普通教育，即寻常中学、小学亦能设立此科，以善美为主题，令其在课程教学中占据主要地位。③

其次，应设立国语专门学校。增设诸如皇典讲究所般的国语专门学校。以国语进行讲习，探究日本原音以及原语之情状。这时期，日本已有几所国语学校。如，国语传习所，建于明治 22 年 11 月；国文国史讲习所，建于明治 23 年 1 月；国文语学专门学校，建于明治 23 年 1 月；国语讲习会，建于明治 23 年 3 月。④ 上述四校建立之宗旨，可由下列两则资料获知。一是《国语传习所趣旨书》，一是《国文语学专门学校趣旨书》。前者之趣旨大致为：国语是为巩固国体之物。国语当与“邦国”（非国家）共存亡，此为万国所共识。现今，日本尤应国语之建设，缘此关系日本独立之巩固与否。目前，外人杂居日本，若不彰显并确立国语，已受汉语左右之日本文典将蒙受更多之压制。因此，日本政府在指示大中学校成立国文国语科后，亦应在小学校内设置国语科。譬如西洋诸国，普通小学校均设置会话文典类课程。应深感振兴国语之必要，特设此国语传习所，以大中学校之博士教师为教授者，针对一切男女长幼之国语向学者，冀望同志者于此学共同讲习国学。⑤ 后者之趣旨大致为：国文语学当务之急在于文学教育之范畴内，向习学者灌输热爱国体之观念，培养习学者国民之操守，讲明人种之由来以及国家独立之重要，即逢国家发展之重大时期，处洋人于内地杂居之特别情势，又为法律明文上之必要学科，照海外一般学制，

①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96—102 页。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11—112 页。

③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15—117 页。

④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20 页。

⑤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21—122 页。

以自国语法、文则为重，此乃出于维护一国独立之需要等等，确立国文语学实为当下之急。然，日本现有之日用普通文体，并未确立一定之规则。学校老师在教授读书作文时亦不辨语法文则。而从事著作翻译之辈，在评述文章之际，唯论其意义之美妙、趣向之巧拙，于文法规则向无追求，以致流弊横生。政治家、教育家应视国文语学科为维护一国独立之基础，于国民教育肩有重大职责。自此，冀望学校教师、著作翻译者能齐心协力，共同确立日用普通文体之文法规则。文部省于学制应大力发展国文语学教育，有计划地将其纳入大中小学的考试科目以及教学科目，并颁布奖励措施。唯有此方有本邦未来发展之前途。该校于明治 18 年即有创设之计划，到 23 年才得以最终成立。此前，创建者就国文语学已作专门调查之研究，明确其培养宗旨在于养成国文语学家，并据此确立国语的规范形式普及国语，以维护国家之独立精神。①

第三，应向小学生教授缀字书（即拼写方法书）。佐藤宽以为开展国语教育，当从教授缀字书开始。在此阶段，受业者应当在朗读教科书过程中逐步区分并了解诸如丝、犬、碇等有形名词，诸如孝、悌、忠、信等无形名词，以及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于此基础之上，受业蒙童当进一步理解语言的作用以及掌握缀字法，为将来学习语格文法做好准备。所谓缀字法就是将训读假名中的一部分转化为汉字的方法。比如，“今”写成“今マ”，“又”写成“又タ”，“只”写成“只タ”，“習”写成“習らふ”。如此一来，利用者不仅可以通过假名部分知晓语词含义，又可记识汉字。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汉字穿插进假名文体里。由此可知，日本的国语运动之宗旨，就是以大众化的雅俗混淆体为基础，进一步削减该体中的汉字部分，并将汉字与旁注训义假名以一种固定的方式结合起来，以达到以假名为主，汉字为辅的改良目的。自此，假名逐渐反末为本，与汉字之地位开始发生转换。无疑，缀字法的确立以及在小学校传授的开展是日本国语运动的结果。②

第四，推行国语标准话。这是必然趋势，即若要真正实现一统，则必备统治之文字文体以及发音。第五，向国外输出国语。这是获得国际认可之重要方式。第六，改良新闻杂志以及稗史小说的写作文体，因为此类文章的读者日众，若能改良，对于大众的影响将至远至深。第七，政府应参与语学之改良，即以诏敕、布告、布令、布达、训状等形式，要求公、私立学校采用以规范文体编撰的教科书。该文体应是平朴易读，可参照和汉混淆体（即雅文变体）。佐藤宽建议从今以后，政府应下令所有政府文书均须以和汉混淆体进行书写，学校教科书亦应以该体编撰。而社会上刊行之新闻杂志、稗史小说亦应自觉利用和汉混淆体。如此，日本才能最终确立统一稳定的书写文体。③

佐藤宽的研究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他不断在具有最高学府意味的皇典讲习所发表演讲。明治 26 年 3 月，佐藤宽再次在皇典讲究所演讲志上发表题为《确立国语的二大方案》的文章，提议应编纂国语词典和俗语词典，并将其纳入全国小学校的课程中去。7 月 25 日，细川润次郎在国语讲习会（第一高等中学校）上发表题为《于国语讲习会陈述所见》的讲演，指出国语之存亡关系到国家之存亡，所以当谋求发展国语之道。8 月 6 日，文部大臣井上毅莅临国语教员夏季讲习会，发表演讲，强调在国文发展上，必须以国文之组织为经，以汉文汉字教材为纬来进行。当时，小中村清矩就德川时期平易的夹杂汉字之文，指出应折中神皇正统记、太平记、盛衰记等古文，来确立普通文的范本。9 月，目黑和三郎在皇典讲究所演讲志上发表题为《期待语格固定方案的提出》的文章。10 月，福地源一郎其题为《明治今日的文章》的文章中，感叹汉语之“跋扈”，讲述其现象发生之原因，指出一国之语言是其国家独立之必要条件，遂建议为了实用文章之发展，当驱逐此“妖魔”，恢复国语之势力。加藤弘之也发表题为《小学教育改良论》的

①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23—124 页。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31 页。
③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第 160 页。

演讲，论述因使用汉字所带来的困难以及排除此困难的方法。①

显然，这一时期，文字文体改良的呼声虽然不断，但于官方而言，文字文体到底怎么改，仍有待商榷，而在缺乏成熟改革方案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并不愿轻易改变现状，所以我们基本看不到关于文字文体改革的政令抑或措施出台。不过，随着具有独立意味的“国语”观念的浮出，日本文字文体的改良雏形其实已然现出。

余论

19 世纪 80 年代，在日本，西学、汉学之争仍是焦点。当时有些人以为，欲兴西学，就当弃汉学，弃汉学首当废汉字，因汉字不废，文字将不能简化，而文字繁复，必将影响近代国民教育的展开，近代教育不兴，所谓文明开化就变为空谈；反过来，若废汉字，且弃汉学，日本恐将失去自己原有的历史精神，而与自己通过汉学建立起来的学术思想发生割裂，受之影响，日本的风俗或将走向败坏。结果，由此引发的汉学者与西学者之间的纷争不断上演。而在社会舆论未朝着一个主流方向发展之前，日本政府于文字文体改良虽在行动上做了些许尝试，但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反映在小学教科书的编纂上就是，虽然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为降低课本内容的难度，尽量不用或少用汉字，代之以假名，但小学整个阶段所应掌握的汉字数量却并未因之发生变化，只不过将汉字学习放入了稍后的学习阶段。这一现象印证了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汉字汉文何去何从，仍保持着谨慎的静观态度。

民间舆论之所以在汉学、西学间摇摆，政府之所以保持观望，迟迟不愿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原因之一确实在于，弃汉学就西学带来的最大社会问题将是道德教育的缺失。由于西方社会依靠基督教来完成道德教育，日本如果想通过相同的方式完成道德教育，就意味着日本全国民当皈依基督教，这显然不能为信奉神道的日本所接受。在日本，一个问题日益凸显：近代教育在强调实学教育的时候，又如何完成道德教育？1890 年 10 月 30 日，天皇向日本臣民颁发了立教圣敕：

> 朕惟フニ我カ皇祖皇宗国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徳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々厥ノ美ヲ済セルハ此レ我カ国体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実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ニ相和シ朋友相信シ恭倹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学ヲ修メ業ヲ習ヒ以テ智能ヲ啓發シ徳器ヲ成就シ進テ公益ヲ廣メ世務ヲ開キ常ニ国憲ヲ重シ国法ヲ遵ヒ一旦緩急アレハ義勇公ニ奉シ以テ天壌無窮ノ皇運ヲ扶翼スヘシ是ノ如キハ獨リ朕カ忠良ノ臣民タルノミナラス又以テ爾祖先ノ遺風ヲ顕彰スルニ足ラン②

这依然是汉文直译体。在政府层面，汉文直译体即汉文变体依然是首选书写体。文中“尔臣民”乃指称当时已被社会民众认可并广泛使用的“国民”。在这道敕语中，天皇首先强调国民的忠孝心依然是“国体の精華”和“教育の淵源”，在此基础上又当孝顺父母、夫妇和睦、兄弟友爱、持己恭俭、潜心修学、成就德器、经世济用、义勇奉公等等，表明教育目标首在育德。诚然，对于走入现代化历程的国家来说，教育是立国基础，因国家观念之养成有赖于国民教育。而宣扬国家观念除仰仗语言文章外别无他法。于此，日本文字文体改良运动成功与否实关系到日本现代化事业之发展。然而，若一味废除汉字，追随西方，即追求所谓完全独立之精神状态，其后果是抛弃汉学，而抛弃汉学则形同于抛弃汉学身后以立德为本的东方精神；但若要维护东方精神，汉字毋庸置疑不可废。在反复权衡之下，较汉字废除论，更多的日本人选择了汉字限用主张，只不过在限用设定上会产生争议。近代教育需要简洁易行的文字文体，在日本，和汉混淆体将因其符合各方要求而被推广。即便如此，日本仍然有股保守势力，他们不愿或不愿过多放弃汉

---

①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日本书籍株式会社，明治 37 年。

②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附录，第 2—3 页。

字，明治24年1月，汉字不可废论者——井上圆了发表题为《汉字论》的文章，竭力向公众解说汉字构造法，指出若以此构造法向受教者教授汉字，汉字记忆不应是件不可克服的事情。①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里，各种声音在影响着世人，同样也在影响着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推行者们，改革者的步履虽然艰辛，但在求生存并极力求发展的欲望下，我们看到西方新事物还是日渐被日本民众所接受，最终化为日本推进现代化的力量。即便如此，日本上至政府，下至民间，抛开激进改革者的言论不谈，大多人群，对于汉字汉文进而汉学，并没有抱着弃之如敝履的态度，而是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尽可能地在因社会发展所需必将产生的新书写中为汉字汉文保留了一席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1]《太政类典》，第3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09－00·太00660100。

[2]《太政类典》，第4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09－00·太00742100。

[3]《公文录》，文部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2A－010－00·公03984100。

[4] 日下部三之介：《小学读本 卷一》，东京金港堂，1886年。

[5] 井田秀生：《国民课本 卷四》，长岛为一郎出版发行，1887年。

[6] 青木港三郎编纂：《普通读本字引》，东京：集英堂，1887年。

[7] 佐藤宽：《日本语学新论》，东京文明馆藏版，东京：东京堂出版，1901年。

[8]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东京：日本书籍株式会社，1904年。

The Meiji Government's Attitudes towards Kanji and Chinese Literature under the Public Opinions of Reforming Characters during the 1880s

CAO Wen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aowen330@sina.com)

During the 1880s,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Learnings was still a key issue in Japan. It was necessary to abandon Kanji (Chinese scripts) in order to develop modern education. If Kanji were abandoned, Japan worried about that Japanese academic thought based on Chinese learning would be dissevered. Before the public opinions reached certain consensuses, Japanese government in many ways tried to reform the writing system, but its attitudes towards Kanji and Chinese literature did not change. As far a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xtbooks of elementary school was concerned, Kanji was not used as possible in the early stages. Instead, Hiragana or Katakanawas used. However, the number of the Kanji that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ad to master did not decrease and they had to learn those Kanji in their senior stage of elementary school. This phenomenon verifies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still cautious of Kanji's future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① 国语调查委员会编纂：《国字国语改良论说年表》，第22页。